

愛國主義教育與香港



名家縱論

劉兆佳

2023年6月26日，全國人大常委會首次審議《中華人民共和國愛國主義教育法（草案）》（《草案》）。《草案》表明中央將以法治方式推動和保障新時代愛國主義教育。

《草案》第二條列舉了愛國主義教育的主要目標：「國家在全體人民中開展愛國主義教育，培育和增進對中華民族和偉大祖國的情感，傳承民族精神、增強國家觀念，壯大和團結一切愛國力量，使愛國主義成為全體人民的堅定信念、精神力量和自覺行動。」尤其重要的是第三條的規定：「堅持愛國和愛黨、愛社會主義相統一，以維護國家統一和民族團結為着力點，把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實現中國民族偉大復興作為鮮明主題。」

鑒於香港實行「一國兩制」，而且實際情況和條件與內地差異甚大，所以香港在達到愛國主義教育的目標時中央將會採取適合香港獨特環境的政策和措施來推動愛國主義教育。第二十二條規定：「國家採取措施開展歷史文化教育和國情教育，增強香港特別行政區同胞……對國家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認同，自覺維護國家統一和民族團結。」

其實，早在2019年10月，中共十九屆四中全會已經決定要「加強對香港、澳門社會特別是公職人員和青少年的憲法和基本法教育、國情教育、中國歷史和中華文化教育，增強香港、澳門同胞國家意識和愛國精神。堅決防範和遏制外部勢力干預港澳事務和進行分裂、顛覆、滲透、破壞活動，確保香港、澳門長治久安。」

2022年10月16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共二十大上的報告中提出要「發展壯大愛國愛港愛澳力量，增強港澳同胞的愛國精神，形成更廣泛的國內外支持「一國兩制」的統一戰線。堅決打擊反中亂港亂澳勢力，堅決防範和遏制外部勢力干預港澳事務。」

2023年7月24日，習近平主席給香港培僑中學高一年級全體學生的回信中表示：「愛國主義是中華民族精神的核心，廣大香港同胞素有愛國愛港光榮傳統，這是「一國兩制」行穩致遠的重要基礎。」

毫無疑問，愛國主義教育關係到「一國兩制」的成功實踐、國家安全的維護、「愛國者治港」的體現、香港的長治久安和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推進。

長期以來，「愛國主義」和「愛國主義教育」在香港都不是常見的詞語。在部分香港居民特別是反對勢力眼中，它們所謂的「國」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由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是經過中國共產黨艱苦卓絕奮鬥才建立起來，所以「愛國」也必然包含了「愛黨」的意思。由於歷史原因，香港社會長期存在着對中國共產黨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抵觸或逆反情緒，所以在反對勢力的煽惑和詆毀下，「愛國主義教育」無從提起，就連「國民教育」和「國情教育」也因為被「污名化」而舉步維艱。2012年，香港特區政府計劃在中小學推行國民教育，反對勢力則乘機策動「抗爭」行動，導致有關計劃被無限期擱置，而是否和如何推行「國民教育」則由各學校自行決定。

推行的主客觀條件已成熟

「國民教育」之所以在香港推展困難，其實與香港過去的「殖民地」歷史有密切關係。在我2020年出版的《思考「一國兩制」的未來》一書中指出，「在殖民管治下，香港人的國家概念和民族意識難有充分發展的空間。英國人特別忌憚中國內地洶湧的民族主義對其在香港管治的影響。」「英國人在香港對傳統中華文化並不抗拒，但從維護殖民管治角度出發，卻長期刻意以各種有形和無形的手段灌輸香港人對中國內地和中國共產黨的負面態度和對中華文明的輕視，『親英』精英、公務員和年輕一輩所受影響尤其顯著。」

香港回歸祖國後，中央不希望在香港引起衝突和不安，特別是不希望在國際上引起對中央落實「一國兩制」的質疑，所

以沒有在香港搞意識形態的「去殖民化」和推動「國民教育」。我在2015年出版的《「一國兩制」在香港的實踐》一書中指出，「在「去殖民化」缺位的情況下，香港人對香港成為英國「殖民地」的因由、對香港歷史的變遷、對中國與香港的複雜關係、對香港歷史與中國歷史的相互交織、對影響香港發展的成敗得失的因素、對香港人作為中國人的本質、對現代和當代中國歷史、對香港與中國乃「命運共同體」、對社會主義中國、對內地同胞、對香港人在「一國兩制」下維護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的責任、對香港社會蘊藏着的大量華夏文化傳統與華人社會「基因」等問題都缺乏足夠的認識、了解和反思。」

過去幾年，中央主動出手撥亂反正，制定和實施香港國安法，完善香港特區選舉制度，將反中亂港分子和其背後的外部勢力從香港的管治架構驅逐出去，和基本上建立了「愛國者治港」的格局。在新的政治格局下，反對勢力和其支持者再難在香港社會策動政治鬥爭，中央、特區政府和愛國愛港力量因而得以較積極和有效地在學校和社會逐步推行各種與國民教育和國情教育有關的政策、措施和活動。

儘管部分香港居民對國民教育和國情教育在思想和感情上仍有一些疑慮和抗拒，但相比以前已經有明顯減少，而訴諸於「抗爭」行動的人則絕無僅有。與此同時，香港又在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道路上闊步前進。所以，當前推行「愛國主義教育」的主客觀條件已經基本上具備。

無論是對中央、香港特區政府乃至愛國愛港力量而言，相對於國民教育和國情教育，如何有效推進「愛國主義教育」更具挑戰性，特別是在如何達至「堅持愛黨、愛國、愛社會主義有機統一」上。我認為，要穩妥推進「愛國主義教育」，除了在國民教育和國情教育的基礎上進一步加強學生和社會各界對國家的發展方面、中央的大政方針、內地的情況、國家所面對的機遇和挑戰和中央的「一國兩制」方針的認識外，有需要強化他們對中國共產黨、中華人民共和國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認知

和認同。

長期以來，在反共反華勢力的挑唆和詆毀下，「中國共產黨」一詞被部分香港居民視為「政治敏感」詞語，「愛國」則往往被解釋為愛「歷史中國」、「文化中國」、「地理中國」或「民族中國」而非實際上存在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而西方的「資本主義」和「自由民主」體制乃至香港的「資本主義」則經常被一些人吹捧為比「社會主義」優越。這些方面的錯誤認知都是妨礙「愛國主義教育」推行的因素。

成功落實的四個衡量標準

此外，超過一個半世紀的「殖民管治」在部分香港居民尤其在社會精英當中產生了一定程度的「民族自卑感」、「崇洋媚外」和「揚西抑中」扭曲心態，這種心態肯定妨礙愛國情懷的孕育，而「愛國主義教育」的要旨正是要改變這種心態並顯著提升香港居民對國家和民族的信心和自豪感。

對香港而言，成功的「愛國主義教育」的度量標準應該是香港居民是否認同、尊重和信任中國共產黨，他們是否以自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為榮並願意承擔對國家的責任，他們是否同意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最有利於中國發展和中華民族復興的制度，以及他們是否明白到香港在「殖民地」時期所取得的發展成就絕對不能只「歸功」於英國「殖民管治」。

就提升香港居民對中國共產黨的認同、尊重和信任而言，中央、特區政府和愛國愛港力量的工作重點是向香港居民大力和全面介紹和講解中國共產黨在建設統一、獨立、富強、幸福、團結、能夠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的中國的過程中的豐功偉績，以及中國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所享有的崇高國際地位和巨大影響力，並明確指出中國共產黨是那個對香港絕對有利的「一國兩制」方針的開創者、發展者和捍衛者。

就推動香港居民以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為榮並願意承擔對國家的責任而言，中

央、特區政府和愛國愛港力量的工作重點是要講述國家在各方面包括經濟、科技、軍事、扶貧、外交等多方面的舉世矚目成就，指出國家在崛起過程中所遇到的來自美西方的遏制和威脅，講明香港既是美西方打壓的對象也是美西方用來危害國家安全的棋子，以及強調維護國家安全既是香港居民的責任也是香港居民的切身利益所在。

就推動香港居民同意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最有利於中國發展和中華民族復興的制度而言，最佳的切入點是臚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在多方面的優越性、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與中國民族偉大復興的關係、介紹眾多發展中國家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推崇和借鏡、過去其他發展模式在中國的失敗經驗、突出西方發展模式的缺失和崩壞和介紹那些採納西方發展模式的發展中國家的失敗經驗。

就糾正香港居民對「殖民管治」的認知缺失而言，主要可以點出在「殖民地」長期存在的種族歧視、高壓統治、社會分化、缺乏人文關懷和政策短視等現象，指出香港的經濟發展尤其是工業化離不開本地和來自內地的華商和華人工業家的努力，強調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中央政府對香港的支持和關愛對香港「經濟奇跡」的貢獻，用「東江之水越山來」和「三趟快車」作為中央政府關愛香港居民的最佳實例，而國家改革開放後為香港發展和產業提升所帶來的機遇和動力更值得大書特書。當香港居民了解到國家和中國人在香港在「殖民地」時期所取得的發展成就的重要性的必要性後，他們對中國共產黨、中華人民共和國和中華民族的信心和信任將會有所提升。

總而言之，推行「愛國主義教育」的核心目標，是要讓香港居民感受到在新時代和新形勢下自己與中國共產黨、中華人民共和國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已經成為了命運共同體，從而產生濃烈的休戚與共的情感。

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榮休講座教授、全國港澳研究會顧問

法庭拒批禁制令 理據難令人信服



議論風生

陳子遷

上周五高等法院就特區政府律政司入稟申請禁制令，禁止以任何方式傳播鼓吹「港獨」的歌曲《願榮光》頒布書面裁決。判詞認為，香港國安法等已經可以處理煽動等罪行，不信納禁制令會有真正功用，故拒絕批出禁制令。筆者對是次裁決非常失望，認為法庭的決定並未充分考慮到事實理據，亦不符合維護國家安全和法治原則，裁決理由明顯值得商榷，執行禁制令根本不會存在「一罪兩審」的情況。

歸納法官的判詞，法庭拒絕批出禁制令主要基於七點理由，其中提到，法庭需在社會上互相抗衡的利益之間取得適當平衡，並在應用香港國安法時，尋求與本地法律銜接、兼容和互補。律政司是次的申請，是要求法庭行使特殊權力，批出針對所有身處香港者的禁制令，並以協助刑事法律。考慮到禁制令會對無辜的第三方造成影響，法庭只會在深思熟慮後才會如此行事。但總結起來，判詞無非是指香港國安法頒布實施後，當相關刑事罰則遠比禁制令引出的民事罰則為重，擔憂禁制令與刑事法律有衝突，存在「一罪兩審」。

筆者認為，該理由難以令人信服。律政司申請禁制令「不是針對全世界」，僅針對有禁令相關行為及意圖、「正在干犯和有意干犯」的人，只是針對極少數藉着使用有關「港獨」歌曲作出危害國家安全的非法行為的不法之徒，以維護大多數的市民的福祉，保障國家安全和香港的社會穩定。

不存在「一罪兩審」的情況

其實高院對批出禁制令或會與相關刑事法律有衝突的顧慮，是根本不必要的。因為香港國安法由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的全國性法律，並列入香港基本法附件三，由香港特區在當地公布實施。國安法在香港具有凌駕性地位。國安法第六十二條列明：「香港特別行政區本地法律規定與本法不一致的，適用本法規定。」

尊重法治是香港社會的核心價值，法官審理案件時只按法律和證據獨立行事而不受任何干涉。基本法保障律政司主管刑事檢察工作，不受任何干涉。實際上，也不會存在「一罪兩審」的情形，法庭批出禁制令和檢控香港國安法罪犯不能混為一談，相互間兩者並沒有衝突和矛盾。

法庭批出的禁制令，是受到香港社會絕對尊重及嚴格遵從的。例如，2014年非法「佔中」期間，有團體向法院申請禁制令，禁止「示威者」佔據金鐘及旺角多個路段，法庭批出禁制令後，制止了非法「佔中」氾濫失控的情況。有關禁制令的執行難度較阻止有關「港獨」歌曲散播大得多，相信絕大多數市民都會堅決抵制、遏制「港獨」蔓延，不會以身試法。禁制令絕對會有真正功用，社會各界也會堅決執行，以實際行動阻止任意鼓吹、煽動「港獨」的違法言行。

律政司有必要提出上訴

律政司申請禁制令時，已強調只針對有意違令者，沒有意圖作出有關行為或沒有作出有關行為的人不屬於被告範圍內，而涉案行為將於禁制令頒布後才被禁止，若有人在禁制令頒布前已發布及傳播該首「港獨」歌曲，則須按事實及證據去判斷懷疑的行為是否屬於持續行為。律政司還表明，會為新聞工作加入豁免條款，豁免記者在執行新聞工作活動時的禁制令及民事責任，進一步釋除社會的擔心，不存在「對無辜的第三方造成影響」的情況。

正如行政長官李家超在回應判決時強調，國歌是國家主權的特徵，涉及國家的尊嚴及主權，絕不容許被侮辱、貶損或曲解。他表示，危害國家所帶來的威脅是可以突如其來的，故必須採取有效的措施，以防範制止及懲治這方面的罪行和活動，這正是政府申請禁制令的主要目標。

筆者認為，律政司有必要考慮通過上訴、直接以香港國安法執法或修訂《國歌條例》等本地相關法律等方式，防止有關「港獨」歌曲繼續為禍，傳遞對「港獨」零容忍的明確信號。立法會議員也應積極考慮提出修訂《國歌條例》，令條文更加清晰。

律師、吉林省政協委員、西江聚賢法律專業人才委員會主任

美把持APEC肆意破壞國際規則

國際關係

張敬偉

美國媒體早前引述消息報道，美當局決定「禁止」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李家超出席11月在三藩市舉行的亞太經濟合作組織（APEC）領導人非正式會議。雖然有關消息未獲美國政府證實，但美國當局作出這樣的舉動也不令人驚奇。

一個多月前，包括參議員盧比奧等四名反華參眾議員致函國務院，聲稱要「禁止李家超出席」APEC會議。四名反華議員看來是目標得逞，卻再次將美國國內反華政治主調暴露無遺。當然，也凸顯白宮和國會上在大選年更激烈的權力博弈。一方面，民主共和兩黨為了總統大選，在內政上互相傾軋，政治極化和社會撕裂因為大選而更加嚴重；另一方面，兩黨政客卻在外交上通過比拼誰更反華來凝聚民意，轉移國內民怨。

自降國格的愚蠢行為

當前的中美關係緊張又複雜的情況下，反華議員透過跨黨派方式向華府施壓試圖禁止香港行政長官出席APEC會議，既是美國反華政治逆流的體現，也是兩黨權鬥的投機算計，也是美國政府對華複雜外交的折射。但無論是美國國會反華議員的跨黨派操作，還是美國政府被國內反華政客所綁架作出的錯誤決定，都不符合美國作為全球大國的形象，堪稱自降國格的愚蠢行為。

今年2月，美國副國務卿舍曼向國會表示計劃邀請李家超出席APEC會議，並稱李家超出席會議對促進區域經濟對話以及中美共同努力維護全球宏觀經濟穩定來說很重要。現在，華府在反華議員的壓力下禁止李家超出席會議，不僅意味着美國政府對華的體面性硬傷，也代表美國政府言而無信。更諷刺的是，香港行政長官被禁止出席APEC會議是因為被美國所謂「制裁」。這種「制裁」本身就是美國霸權主義的惡劣證據，將這種擺不到檯面上的理由作為禁止APEC成員出席會議的理由，也再次暴露美國施長臂管轄的危害性。

當然，美國政府也不忘給自己不合當的行為進行遮掩，在拒絕邀請香港行政長官出席APEC會議的同時，強調香港可以派出其他官員出席會議。但越是如此，越說明美國難以自圓其說。首先，美國沒有任何理由禁止香港行政長官出席APEC會議，APEC有自己的規則與慣例，即該組織不屬於任何一個國家，它是一個經貿組織而非政治組織，美國和香港均是APEC的成員，地位平等。美國作為今年APEC會議的東道主，邀請

所有成員出席會議是其責任。美國以國內法、因國內政治權鬥或意識形態因素，禁止成員出席會議，本身就是違反了APEC的基本規則和慣例。

而且，美國向來在國際社會標榜所謂基於規則的國際秩序。那麼，美國破壞APEC的規則與慣例拒絕邀請香港行政長官出席會議，這是美國自毀承諾的打臉行為。美國用實際行動違反基於規則的國際秩序，反而不斷指責中國等違反國際規則，不僅是「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的霸道行為，也是美國推行功利外交的雙重標準行為。因為美國主張的所謂國際秩序，是建立在維護美西方利益的基礎之上。這個西方秩序基礎的兩大支撐點一是西方意識形態的所謂政治正確，另一個是必須為西方利益服務且為西方所主導。由於美國習慣了在雙邊或多邊機制中頤指氣使，對於國際關係或多邊機制總是以西方意識形態和是否符合美國利益作為評價，這就導致美國不僅動輒對其他國家或地區（含領導人）單方面實施制裁，也將國際多邊機制變成美國打壓其他國家和地區的武器。

不過，美國把APEC會議當成政治武器，不僅僅是暴露了美國更多的硬傷，更是自損形象自降國格。誠如前述，美國破壞APEC的規則和慣例，戳破了美國指責他人破壞國際規則的謊言；拜登政府言行不一且被國內反華政客所綁架，則是美國政府嚴重的失信行為，也體現美國政府的惡鬥以及白宮治理能力的低下。

為兩國關係抹上陰影

此外，美國以所謂「制裁」為理由禁止李家超出席會議，也是自相矛盾。因為香港行政長官是美國以不正當的理由實施所謂「制裁」，現在美國竟以「制裁」為由禁止香港行政長官出席APEC會議。因此，這是一場不高明的政治遊戲，荒唐又可笑。

一方面，美國此舉讓APEC會議充滿了政治算計，給APEC會議留下了美國刻意製造對抗的污點；另一方面，也使美國對華高頻外交的努力打了折扣。從國務卿布林肯到財長耶倫，再到美國總統氣候問題特使克里，美國高層官員接連訪華，加上商務部長雷蒙德也計劃訪華，美國總統拜登樂觀預期中美關係即將解凍。但是，華府在APEC會議上的政治操弄，不僅無益於改善中美關係，甚至會對中美元首可能的會晤帶來負面影響。

國際關係學者